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罪与罚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臧仲伦 / 译



PENGUIN CLASSICS

企鹅经典

罪与罚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臧仲伦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 F.)著;

臧仲伦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3

(企鹅经典)

书名原文:Crime and Punishment

ISBN 978-7-5366-8146-0

I. 罪… II. ①陀…②臧…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8415 号

罪与罚

ZUIYU FA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伦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谢仲伟

封面设计: 余 静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中青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20.25 字数: 598 千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英文版导读

1866年初,《罪与罚》第一部分在米科海尔·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上连载刊登,立即受到了公众好评。此时小说余下的部分还没有完成,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贫困和债务中苦苦挣扎。交稿期限一天天临近,即便如此,他和他的读者内心都感觉到这部小说会是其创作的巅峰,因为书中既包含外部世界的无情变迁,也包含内心精神世界的警醒。一位匿名的评论家写道:“这部小说会成为《死屋手记》作者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犯罪,作者用隐约的诚实和细腻的手法描绘了耸人听闻的犯罪情节,以精细的精神和心理刻画,身临其境地叙述着情节的突然变化。从最初的犯罪动机到事件最后的发展结果,其间主人公迂回不安的心理转变……在描述他的主人公们偶然遭受的苦难这点上,作者的主观性并没有受到伤害或影响,因为他的重点集中在单一人物身上,而且这本书本质透明,充满美感。

小说其余的部分开始刊载的时候,引起了社会和公众的注意。在回忆录中,评论家 N.N.斯塔科夫回忆说,“《罪与罚》是俄国文坛那年最轰动的一部小说,唯一一部让阅读界痴迷谈论的著作。人们在谈论它的时候通常会抱怨它那扣人心弦的强大力量,造成读者情绪上的抑郁,精神承受力好的会郁郁寡欢,精神承受力差的干脆把它放在一边。”小说的“抑郁”特质非常明显。小说对社会悲惨和精神病态的描写甚至都震惊了《悲惨世

界》的读者，那是维克多·雨果在同时期发表的作品。陀氏从这部小说中吸取了灵感，借鉴了一些结构和全景方面的元素，除此之外的一个事实是，小说攻击了俄国学生群体，将俄国激进青年和虚无主义者的陋习置于学生身上，他们强烈地反抗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早期的评论中，自由和左翼批评家都传论着小说中谋杀老女房东的情节是在影射政治暗杀，他们将小说视为一部加重“反虚无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作——这股思潮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他们还站出来为“俄国的学生群体”打抱不平：“有过学生因为抢劫而谋杀的案例吗？”批评家G.Z.叶利谢耶夫在《现代人》上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即使有这样的例子，能够证明这代表了当下学生群体中的普遍情绪吗？……不是柏林斯基提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事实，空想存在于“精神病院中，而不是文学中”吗？……柏林斯基会如何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新的怪诞思想呢，即所有年轻一代，集体被指控为了抢劫而谋杀？

一位匿名的评论家在报纸《周报》上继续阐述上述评论（恰恰反映了自由保守派的观点），他写道：

充分考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才华，我们无法悄无声息地忽视他最近一部作品中用特殊力量体现出的忧郁征兆……陀氏对现在的年轻一代感到不满。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评论的。这一代身上确实有一些需要批评的缺点，但只有用一种令人尊敬的角度加以评论的时候才最能体现出批评的价值，而不是片面地批评否定。例如，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就用这种手法描述年轻一代的过错（应该说是非常不成功的）；尽管如此，屠格涅夫开诚布公地叙述故事，而没有把事实素材变成肮脏的暗讽……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没有这样做。他用一种不坦率的手法描写年轻男子谋杀，年轻女子沦为妓女的这些事实，而不是公开表明其自

由主义观点和自然科学理论。

虚无主义评论家 D.I.皮萨耶夫，与其他人一样意识到这部作品的艺术活力和绝对无法逃避的时事性内容，他尝试了另一种评论角度。他的评论基础是小说的“社会”内涵，他认为拉斯科利尼科夫是他周围环境的产物，而陀氏大声疾呼的激进的社会变革可能会发生。一个新社会的建立，不是由于克里斯坦尼提·索尼娅，而是由于革命活动。几乎只有斯坦科夫一人努力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到小说的普遍悲剧这一层面上来。小说讲述了社会引发的个人苦难，一个年轻人如何被“虚无主义”思想所摧毁，然后不得不体验赎罪和救赎的过程。斯塔科夫指出了陀氏对笔下主人公的热情，并评论道：“这不是对年轻一代的嘲讽，也不是责备和指责——而是写给他们的挽诗。”

对于斯塔科夫的这篇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非常有名的回应：“只有你了解我”。这句话在历史的岁月中回荡着，因为人们一直讲述在诠释《罪与罚》时遇到的困难。即使在 20 世纪后半期，那些批评研究的中心思想不是忽略了作者想象艺术“克服”的意识形态上的表达方式，就是扭曲作品，使之成为无法被人们认可的拙劣的模仿之作。比如美国评论家菲利普·拉夫，他在一篇文章中评说了这本书中融进的一些素材和背景资料，指出“索尼娅的信仰不是靠斗争获得维持的”，而且“对拉斯科利尼科夫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处，他的精神世界是不能和索尼娅放在一起比量的”。对于本书的结局他形容道，“不真实，与整本书格格不入”。事实是对每部作品要有一个确定权威的理解是不可能的，因为会有各种各样的诠释。这些诠释或许是无限的，而且许多批评分析很容易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意识形态方面提出疑问，而不是单纯地从美学角度分析其中的可操作因素。这很难让人觉得惊讶，因为陀氏作品中成熟的想法、构思、概念和结构组成经常会缠绕在一起，让人匪夷所思。虽然有这么多的理由，但对于读者来说，概括出《罪与罚》的原始创作“思想”还是很有帮助的。

也许关于陀氏创作意图最清楚的解释来自哲学家维尔多·S. 斯罗耶夫（1853—1900），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并在1878年的夏天陪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奥普提那修道院朝拜。在1881年到1883年间斯罗耶夫做了三次评论演讲（于1884年发表），其中第一次他绝对简单地陈述了对小说主题的看法。在谈论到《罪与罚》和《群魔》时他写道：

尽管小说有些很有深度的细节，但主题是非常明了简单的，虽然许多人都没有理解。小说主人公是那种要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的代表，并且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可以的。凭着他自身的高傲优势，凭着他相信自己有种力量，他就认为自己被赋予了杀人的权利并且他真的这样做了。但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仅仅是没有经过考虑的暴力，对外部法律的破坏，也是对社会偏见的大胆挑战，然后他自己认为这场挑战并没有那么简单——它变成了一种罪恶，是对内在道德公正的侵犯。他对法律的侵犯虽然没有受到奴役等严厉的法律制裁，他自己却饱受了内心罪恶感的煎熬。这种罪恶剥夺了坚强人类的仁慈之心，并导致了他谋杀他人的罪行——自我崇拜的内在罪恶只有通过自我放弃的内在道德行为才能被消除。他无限的自信心在比“他自己”更伟大的力量面前必须消失殆尽，他自己编织的那些理由在上帝更为公正的审判面前也要相形见绌，这些伟大的力量，公正的审判在简单弱小的人们身上存在着，而在坚强的人们眼中他们不过是一群下贱的无名之辈。

陀氏早期的作品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人物都是那些“简单，弱小的普通民众”，斯罗耶夫将陀氏早期作品的中心思想看做是“在建立事物秩序的过程中存在着古老永恒的新真理，道德上善良优秀的人们在社会眼中是最恶劣低下的一群人。他们被谴责成为穷苦之人，被侮辱且被损害着”。他还说：“如果仅仅把这一问题当做小说主题的话，那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多成为一位优

秀的记者而已。”可重要的是，陀氏把这个问题看做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客观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还要准确清楚，不能有半点儿含糊：“观察一切的好人，感到社会对自身的不公正，于是他们必须要团结在一起，共同反抗这种不公，并用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新建立一个新社会。”就是因为对此理想的追求，陀氏参加了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的社会密谋活动。这是他最初的对于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天真尝试，这次事件把他送上了绞刑台。虽然他最终躲过死神，但还是受到了奴役的惩罚。对“死屋”的恐惧使他开始重新思考社会需要的反抗到底是怎样的，他觉得反抗不应该是整个俄国民众的，而只应该由他和他的同伴们来完成。

斯罗耶夫指出，在受奴役刑罚的过程中，陀氏第一次与真正的俄国老百姓面对面，他们代表了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情绪，由此陀氏“清楚地看到了自己革命斗争的错误之处”：

在奴役劳动营中，陀氏的同伴大部分是俄国老百姓，而且除了几个个别人之外，这些大都是老百姓中的极恶之徒。但即使是极恶之徒，也有着那些精英之辈丧失的品质：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罪恶的意识。虽然这些普通的犯人因其恶劣的行径脱离了普通大众，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并没有与民众脱离，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还是和普通人一样的。在“死屋”中，陀氏发现了真正的“穷人”（或者，更通俗些，“倒霉的人”）。以前的那些人，陀氏已经将他们淡忘，却依然在用自己的尊严反抗或躲避社会的不公。虽然这些不适用于那些犯人，但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东西远不止这些。“死屋”中的极恶之徒让陀氏看到了社会精英们丧失的品质。如果说启蒙代言人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文人领袖前的亵渎让他仅存的那点儿宗教情感渐渐失色的话，那在这里，这个“死屋”中，在那些犯人们卑贱而又虔诚的信仰影响之下，陀氏的宗教情感获得了重生。

斯罗耶夫的分析无疑带有一些他对俄国宗教和人民理论的个人色彩，即便如此，对于他个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直白简略的认识，他人是很难反驳的。在受刑后的岁月中，陀氏没有走向宗教教条主义或持有反动政治思想，他开始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人类精神上的“共享”。这通过俄国人民对于身份认同的共享和谦卑地接受上帝两者表现了出来。

《死屋手记》的完结章节描写了主要人物性格上的再度觉醒。这与陀氏早期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完全相同——早期作品中包含的是人物肉体和精神上受到的苦难折磨，艰苦和宗教的启蒙把这一主题带到了普遍性范围去考量。《地下室手记》中的“我”因为它晦涩讽刺的悲惨与马卡·德伍什金和奥迪诺夫存在的领域是不同的。在那半睡半醒，浪漫又多愁善感的世界观的解放中，在对个人思想，人性脆弱和隐蔽其中的托词的认识中，它需要的身份不是“我”而是“我们”：“至于我自己”，地下人对他的读者们说道，“我毕生都在走极端，你们任何人连这条极端之路的一半都不敢尝试，你们会把自己的懦弱说成是‘理性的判断’并心满意足，自欺欺人。”陀氏早期的作品中采用将叙述者与读者分离的手法（例如《白夜》），摒弃了这种手法而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后，拉近了他与读者间的距离。他探索个人绝望的无助和精神世界的沦丧，以此来煽动读者的情绪——只有通过接受上帝的恩赐才能克服“贫穷”——地下人在这里代表的全体发出了悔恨之声。他写道，“无论如何，在写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一直感到惭愧，这也许根本算不上文学，而更像是纠正的惩罚。”

从《罪与罚》的草稿和笔记中我们知道，陀氏原本打算将这本书写成和《地下室手记》一样的忏悔录，那本书在1864年出版发行。《罪与罚》的基调已经在《地下室手记》中初见雏形，在第二部分结尾处，叙述者在酒店晚餐遭到羞辱后，来到妓院，愤世嫉俗地对待妓女丽莎。我们看到了以下描写：

夜晚将要来临的时候我出门，想散散步。我的头依然很疼，还没有从前一晚的晕眩中恢复。黑暗慢慢袭来，夜幕越

来越厚重，我的语言和思维也随之变得混乱不堪。我身体里的一些东西，深藏于我内心和意识中的一些东西久久萦绕，不愿离去，在那里与灼热的苦闷一起燃烧着。我在最繁华拥挤的街道上徘徊……我特别喜欢在黄昏的时候走过这些街道，在一天最拥挤、各种各样路人最密集的时刻，工人、手工业者，他们的脸上满是厌恶，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走在回家的路上……现在这忙碌的街道让我更加烦躁不安。不管我多努力，我还是无法控制自己。我内在的一些东西不断地涌上来，让我痛苦难受，它一刻也不安宁。在无比的沮丧中，我回到了家。那种感觉就好像我的灵魂充满了罪恶。

这段描写直接取自于《罪与罚》的前几章第一份草稿。事实上，这两部作品在许多地方都是相互联系的，《地下室手记》可以说是《罪与罚》的哲学序言。在7月初的一个夜晚，这个二十三岁，在彼得堡的大街上游荡的前大学生，是地下人精神上的亲属。我们可以认为几周以来他都足不出户，与世隔绝和忧郁症让他思考了很多，这些都记录在《地下室手记》上。在这本小说最早的草稿上，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与《地下室手记》中强迫、忏悔的特性非常相似。二者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地下人的罪恶感只是来自道德和个人本性方面，那是与人类和自我对抗的罪恶；而拉斯科利尼科夫身上体现的首先是对社会结构的彻底挑战，虽然也有道德和性格方面的寓意。

让地下人苦恼不已的“石墙”也出现在《罪与罚》中。但现在它代表的不再只是“自然法律，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结论”，它还是社会法律的象征。围绕在拉斯科利尼科夫身边的那些墙将他困在狭小的斗室中，墙壁不仅局限了“可能性”，还是社会的保护物，用来抵挡社会内部的人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社会秩序中有个根深蒂固的错误，就是监禁；折磨社会中善良的人们，让他们忍受贫穷之苦。但这不能为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罪恶开脱（俄语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更能说明问题，解释了他一直想阐述的“探访”或“犯罪”的问题）。要为社会负责的是生

活其中的人民，不管他们要操控的是如拉斯科利尼科夫一样“激进”的无神论思想，还是如卢仁一样“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他们都会放弃自己对这个社会万物的责任并用各种方法把它们毁灭。就像地下人表达他对“蚁丘”的蔑视，认为现代“文明”的“水晶宫殿”引发最多的是“血流成河”一样，拉斯科利尼科夫也持有相似的论断。尽管如此，他还是打算走进历史的舞台。比起其他任何方面来说，这一点使《罪与罚》成为陀氏创造性思维向前发展过程中最有意义的标志。

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瓦西里·洛扎诺夫（1856—1919）是一位俄国思想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非常深厚且感性——他也是第一位指明陀氏艺术特征的人。他于1893年出版了一份《批评自传体文献》，在这份作品的开始，洛扎诺夫就介绍了期刊《涅瓦》发表的陀氏所有著作。他探讨了文学的功用，察觉到在个人想从“生活琐事”中抽身时，它可以发挥作用，还从普遍意义上去理解人类的存在。历史从个人起源，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事实在于他们身上的人性，独特且永不重复。这在洛扎诺夫看来，就是为什么保守的“实证主义者”科学和哲学永远都无法理解“人类，人类的生命和历史”的原因。统治自然界的法则并不适用于人类社会。“对于恺撒大帝、彼得大帝和你们，我亲爱的读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采取何种方式同其他人区分开来。某种意义上，对于众多星球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与太阳远近不同的距离，而是它们椭圆的外形和各自平等运行的轨道……”与科学和自然哲学不同，宗教和艺术是跟个人的灵魂和内心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关注的是人类内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但并不是每个人全部的经历，而是人类历史的特征特质：原始的平静时期，平静中的堕落和后来的重生。“堕落”阶段凌驾于其他两个阶段之上——大部分的历史都被“罪行和罪恶”占据了，然而“罪行和罪恶”经常与平静背道而驰，它们出现在重生之前并直指重生的过程，也是重获平静的唯一道路。在历史的黑暗中还是有点点希望之光的：

夜越黑，星光就越闪亮。

悲痛越深切，就越接近上帝。

“这两行诗中，”洛扎诺夫说道，“体现了全部历史内涵，体现了千百万灵魂进化的历史。”拉斯科利尼科夫，这个崇拜拿破仑、困顿迷茫、有激进思想的人仅仅走进了他那个时代历史的舞台——就像拿破仑一样。他立刻成为一个独立的灵魂，一个世界历史的代言人，他也能将读者的眼球吸引到他对“黑暗夜晚”的探索上来。他口中“掌控‘蚁丘’的力量”，在现实中，就是陀氏用笔下艺术人物掌控小说读者的力量。洛扎诺夫指出：

这本小说向我们描述了所有情况，其中有对人类灵魂的捕捉，将灵魂拉入罪恶之渊。我们也看到了罪恶本身，而且立即随着罪恶的灵魂，十分清晰地认识到我们进入了一个迄今为止都不曾了解的环境，那里的黑暗和恐怖让他和我们都几乎窒息。小说的总体氛围才是捉摸不定、很难定义的，比其中任何一个段落都要引人注目。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效果，这是作者的秘密，但事实是他确实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氛围中，使我们一起感受内心深处的罪恶感。终究我们自身都没有犯下任何罪行，而且当我们读完这本书后，那种感觉就像从一个狭窄的墓穴中爬出后，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一样。我们在那个墓穴中与一个要把活生生的自己埋葬掉的人共处一室，与他一起呼吸监狱中的空气，闻着尸骨腐朽散发出的味道……

在历史这架飞机上，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存在宛如一个深知心理社会和道德智慧的人物，一个他生活的时代中的细小部分，他可以说出我们所有人身上具有的人类集体的现实。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暴君，一个拿破仑（或者，以20世纪的角度来说，一个希特勒），所以每个人心中又有一个遭受苦难的受害者。用苦难来惩罚暴君的罪行，单是苦难就足以救赎。陀氏要

阐明的是两种可能性的对比，相较于虚无的社会物质变迁，人类自身引发的变化有更多的可能性。小说的手稿和创作笔记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原先计划将这本书写成一部“东正教希望”的小说，表达“东正教的精髓”，这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幸福与苦难并存”，世上的事物“因为对生命的认识和觉悟而不会存在不公（这种认识就是一个人会同时经历肉体 and 灵魂，就是完整生命过程的一部分）。事物都要经过正面和反面两个过程，人们必须选择一个，并带着这个选择一直走下去”。

《罪与罚》的故事是“关于”正面和反面的经历。美好和邪恶的古老神秘，即使如今被披上了 19 世纪中期的当代外衣，依旧让人觉得可怕，好似有种强大的自然力。小说表现出的特点有如莎士比亚式大型悲剧的第一章，其他三章分别是《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章奠定了罪恶与惩罚的主题，描绘出了地狱与炼狱的轮廓，目标天堂若隐若现。“支持”和“反对”的斗争在陀氏脑中激烈碰撞着，我们可以从他的草稿和笔记中看出来。“小说完结章”上的注释说“斯维德里盖洛夫——绝望，最愤世嫉俗。索尼娅——希望，最不切实际。（这是拉斯科利尼科夫自己说的）他充满热情地把自己同这二者联系到一起”。创作笔记中大量篇幅充满了对立和冲突的种子，大灾难的征兆。对于小说的读者来说，虽然结局中的许多情节和暗示都谙熟于心，但还有很多寓意是没有出现在字里行间的，至少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例如“社会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冲突。小说定稿中，对社会主义只字未提，最多涉及了对傅立叶“空想主义”讽刺的观察和责任减少理论——直到《群魔》一书才出现对社会主义论述的巅峰。在《罪与罚》的创作笔记中有详细的说明，笔记也帮助我们了解到拉斯科利尼科夫和地下人之间的关联，明白指出信仰魔鬼的天天使拉斯科利尼科夫犯下了如此罪行。在陀氏看来，社会主义有与生俱来荒谬的缺点——它所倡导的“兄弟一家”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表达了“选择正确道路的人们的绝望。那些社会主义者，通过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还声称是在争取自由！”地下人做了这样的忏悔“如果不统治他人，对其实行暴政，我就无法生

存下去”，这种说法在《罪与罚》中被表现在拉斯科利尼科夫身上：老女房东和她妹妹的尸体代表着暴君的下场，在那基础上他会建立一个崭新的“革新”的世界。

这些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是小说原始构思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在创作笔记中有详尽的记载。在列本兹亚特尼科夫周围工作的是一群虚无主义者，对他们的讽刺并不是为了小说叙述发展而设计的过多的有一定历史烙印的装饰物。虽然幽默，但它更多的是对那代人和人类本性刻薄的攻击。从许多方面来说，叶利谢耶夫的直觉是正确的：小说确实描写了“整整一代年轻人被指控集体为了抢劫而谋杀”。但是他没有认识到的是，陀氏将自己看做是发展初期的虚无主义分子，同时他也在嘲讽着自己。值得注意的是，陀氏恶毒的语言主要是针对那些有名望的中产阶级，是他们奠定了虚无主义理论的基础，并使之成为可能。那些功利主义者，例如本瑟姆，他给卢仁出谋划策。小说最后一章拉斯科利尼科夫做了一个梦，梦中每一个细节都预言了恐惧，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如果放弃信仰上帝，人类将面临多大的危险：

他在病中梦见，似乎全世界注定要遭到一场瘟疫的祸害，这场瘟疫由亚洲的腹地蔓延到欧洲，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十分可怕。除了人数极少的某些优秀人物外，所有的人都将惨死于这场瘟疫之中。出现了某些新的旋毛虫，一些潜入人体的微生物。但是这些微生物乃是一些拥有智慧和意志的精灵。人们一旦被它们潜入体内便会立刻魔鬼附体，开始发狂。传染上这种疾病的人自以为绝顶聪明和只有他们才坚持真理，但是，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自命不凡和自以为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论断、自己的科学结论、自己的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都是不可动摇的，也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整个村镇、整个城市和整个民族无一不因染上了这种疾病而疯狂了。大家人心惶惶，但是又互不理解，人人都以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真理，因而悲天悯人，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绞着自己的双手，痛苦万

状。他们不知道谁是谁非，也不知道对他人应该作何评价，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既不知道谁有罪，也不知道谁无罪。人们在某种毫无意义的仇恨中互相残杀。他们啸聚城镇，结成大军，互相攻打，但是军队在行军途中就忽然自相残杀起来，队伍溃散，军人火并，互相砍杀，你咬我，我咬你，你吃我，我吃你。在一座座城市里，整天警钟齐鸣，把大家召集拢来，但是谁在召集，召集起来干什么，却无人知晓，总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最普通的行当也被弃之不顾，因为人人都在提出自己的主张，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而且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连种田也停止了。有些地方，人们三五成群，啸聚一起，在商量干什么，并且发誓永不分离——但是他们立刻又开始做他们刚才打算做的完全不同的事，开始互相指责，大打出手和彼此厮杀。熊熊大火，烧遍各地，饥荒饿殍，遍地皆是。一切人和一切东西都在毁灭。瘟疫在到处蔓延，范围越来越大。全世界得以幸免于难的只有不多几个人，这是一些纯粹的精英，他们的使命是繁衍新的人种，开始新的生活，更新和净化大地，但是过去，从来没人见过这些人，也没人听到过他们的话和声音。

与骄傲丧失信仰的虚无主义者相反，陀氏还在书中引入了家庭这一主题。生长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中也让拉斯科利尼科夫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变得不再主观化，而更具普遍性。从感性和理性两方面，我们都理解拉斯科利尼科夫是多么渴望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带给母亲和妹妹幸福，带给这个家庭因为缺少父亲而丧失的力量。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拉斯科利尼科夫脱离生命线的程度使他保证自己要生存下去。这个家庭的氛围就是谦卑、包容的相互接受。拉斯科利尼科夫无论从思想还是行动上都触犯了法律——即使这只局限在某种程度内：当杜尼娅了解到哥哥所作所为的原因后，她对他的态度温和了下来，虽然她还是坚定地认为哥哥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而他们

的母亲普利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经历了从开始无法理解儿子行为，拒绝接受他，到后来痛苦地接受两种心境的转变。克服了自身的骄傲，面对社会和国家对他的制裁，拉斯科利尼科夫重回了家庭的怀抱，这象征了民族和公众的身份认同，还有基督教中的亲邻友爱。这些在小说的创作笔记中都有大量记载，例如，拉斯科利尼科夫对老太婆这个“寄生虫”的轻视就被看做是对虚无主义者态度上重大的背离，因为虚无主义者只会关心他们自己。在对创作笔记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小说要阐述对一个人们普遍渴望的理想家庭的观点，这个理想家庭与“蚁丘”或社会主义乌托邦相反，它是建立在“进步”的抽象理论和幻想之上的。通过拉斯科利尼科夫与拉祖米欣的友谊，我们能体会到陀氏对于真正手足之情的理解，这与学生中的“称兄道弟”和激进运动有很多区别。

索尼娅的家庭与拉斯科利尼科夫相仿。家中有个嗜酒成性的父亲，患有肺病的母亲和最终成为孤儿的孩子们。这样的景象起源于陀氏小说《醉汉》，他把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命运故事与这本书相融合，创作出《罪与罚》，两本书中有许多相似的人物。经受住了那么多的磨难，这依然是个家庭，这完整家庭也有着自己神圣家族象征物，例如绿色的围巾和旅行箱。索尼娅的出现不是偶然，这个家破人亡的妓女把拉斯科利尼科夫从孤独的“死亡”中拉了出来，把他从自取其辱和疏远他人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帮他重新建立内心的人类社会。为了重获新生，他就必须经历苦难，他人性的回归必须让十字架来见证，必须发生在俄国的现实中：

“怎么办？”她从座位上腾地站起来，而在此以前一直眼泪汪汪的眼睛，霍地闪出了光辉。“站起来！（她霍地抓住他的肩膀；他微微站了起来，近乎愕然地望着她。）马上去，立刻就去，站到十字路口，跪下，先亲吻一下被你亵渎的大地，然后向整个世界，向四面八方磕头，然后告诉大家，让大家都听得见，说：‘我杀了人！’这样，上帝就会重新赐给你生命。”

索尼娅，这个失去了父母、尊严和名声的女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她明白拉斯科利尼科夫身上缺少的是什麼，他自己放弃了那些。他放弃了上帝，迷失了自己，丢失了自己本性中的圣洁，他只有通过奴役和与俄国民众建立的生存契约才能重获这些。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隐喻地谈到了自己的经历，与此类似还有《死屋手记》中的叙述者杰尔西扬科夫经历的从“棺材”到重生的转变。肤浅地降低标准，只从哲学或纯文学的角度看待索尼娅这个人物，像那几个西方批评家一样，就会曲解小说真正的中心思想。索尼娅和斯维德里盖洛夫都有美好和邪恶的双重特征，对拉斯科利尼科夫来说，索尼娅是美好的一面，而斯维德里盖洛夫是邪恶的那一面。她的罪恶是拜这个不公社会所赐，这点拉斯科利尼科夫同她一样，但索尼娅的纯真是他没有的。就是这点让她可以给予与拉斯科利尼科夫信任的意志和生命的意志，这也是她灵性和“遥远”的原因——在笔记中，陀氏描述了她跟随拉斯科利尼科夫来到受难所。在这段路程中，她带着的是自己和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过去和童年，还有她对这个男人经历成长后的想象。她既是孩子也是母亲，既是家庭也是民族，既是“神圣的傻子”也是天使。第四章第四部分的场景是小说的中心，她大声跟拉斯科利尼科夫讲述着拉撒路复活的故事——这一刻有几乎无法忍受的世俗的苦恼、悲苦、压力，而且这些感觉如哥特式的拱门一样直入云霄，指向天堂。

在关于“正面与反面”的争论中（要注意的是陀氏之后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册就是以此为主题，里面包括伊万曝出的关于大检察官传奇的内幕），斯维德里盖洛夫扮演了魔鬼代言人的角色。约瑟夫·波罗德斯基把陀氏这种写作技巧比作一句经典名言“在阐述你的论断之前，不管你的论断，或你觉得你的论断有多正确，你必须同时列出相反的论点”。当他在塑造斯维德里盖洛夫人物性格特征时，陀氏煞费苦心地把好与坏，正直与邪恶都集中在这个人物身上，以至于有些读者都被误导，认为陀氏是借斯维德里盖洛夫的嘴说出自己的观点。但创作笔记能明确地说明，斯维德里盖洛夫这个人物形象实际上就是《死屋手记》中的阿瑞斯托弗。我们或许记得这个年轻贵族阿瑞斯托